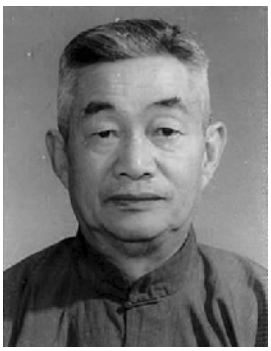
学科先贤

我国现代酿酒技术的开拓者
——朱梅*



朱梅遗像(1909 – 1991)

朱梅,1909 年 9 月 20 日生于四川荣县于佳乡,1991 年 6 月 4 日卒于北京。

朱梅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忙时务农,闲时经商。1919 年,10 岁的朱梅到邻县井研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22 年转学泸州川南师范附属小学,1923 年毕业。随后考入涪陵明德中学,1925 年毕业。中学毕业后,买舟出夔门,考入上海艺术大学,1929 年毕业。毕业后到新加坡光华日报工作,一年后到法国,先在巴黎补习法语,1932 年到 1934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学习酿造,并在该地的皇家夏士啤酒厂实习。1935 年春天离开法国,在新加坡停留 3 个月后,于 1935 年 7 月回国,到山东烟台任烟台啤酒厂厂务主任,不久又担任张裕公司技术副经理。1936 年由张裕公司总经理徐望之资助重返欧洲,在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英国、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等国深入考察酒厂,还访问过巴斯德研究所并在该所进行过研究工作。1938 年朱梅回到烟台啤酒厂,并担任张裕公司技师兼厂长、副总经理。1944 年至 1946 年曾任烟台中国银行技术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梅于 1946 年 6 月到台湾,任台湾省专卖局简任技正兼酒科科长和台北啤酒厂(今建国啤酒厂前身)厂长、台湾酒业公司总经理、技术顾问。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于 1947 年 6 月回到青岛,任青岛啤酒厂经理兼厂长。1948 年回四川后失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朱梅曾任四川泸州专员公署科长。1950 年 8 月,他回到山东,任山东省专卖公司工程师,1953 年 1 月调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烟酒局酿酒工业管理处(后经过几次机构改组,分别属于糖酒局、酒局、食品局)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文化大革命后退休。

朱梅早年曾是我国第一个酿造界学术团体中国酿造学社的首批成员,建国后曾任第 3 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 5、6 届全国政协委员。

青年朱梅在法国和比利时,用不到 5 年的时间掌握了必要的语言工具,从头学习了原先不熟悉的专业知识,为了熟练技能,他经常到酿造工厂和葡萄园从事实际劳动,法国南部的葡萄种植区和葡萄酒酿造工厂留下过朱梅的脚印。这些实际经验,为他回国参加管理工厂打下了基础。他的勤奋和刻苦,赢得了外国朋友的尊重。几十年后还有当年的外国同学的后代来到中国探望朱梅。

在烟台啤酒厂任职时,朱梅靠着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在工厂的实践经验,研究了烟台啤酒厂生产的啤酒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日夜在工厂亲自指导生产,调整工艺,控制质量,在很少外界帮助的境遇中改变了哪些看不起中国专家的‘洋技师’的轻蔑态度,树立了他作为厂长的权威。在张裕公司,他是第一位负责技术工作的中国专家。面对哪些多凭经验逞能的外国技师的技术封锁,他能够较快地破解许多技术难题,更能在工作中注意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本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他在整理和恢复原先从国外引进的葡萄品种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亲自前往欧洲引进一些优质品种。在烟台工作的年代里,他为奠定我国的洋酒产业贡献了力量,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成了中国啤酒和葡萄酒行业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朱梅进入国家的酒业管理部门担任技术工作。他受命组织了 1953 年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名酒的评选活动。为保证‘八大名酒’的质量,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受部领导的派遣,朱梅在这些名酒生产企业做了大量质量管理工作,纠正了只顾产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制订了一系列流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主持了北京东郊葡萄酒厂的设计。在酒业管理的领导部门,朱梅经常在生产现场指导工

*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朱梅女儿章平教授的大力支持并审阅本文。烟台张裕公司陈朴先高级工程师提供了有关资料,谨致谢忱。

作,解决问题。因此,他对全国的酒业生产情况了然于胸。笔者至今保存着他 1964 年 8 月 27 日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业微生物研究室谈‘15 年来我国各种酒类发展情况’的记录。他用今昔对比的方法,讲述了解放后我国各种酒类的发展,指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葡萄酒的产量增加了 150 倍,国产啤酒增加了 7 倍,质量也大有提高,同时介绍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报告中,他历数建国后酿酒科研的成绩,同时具体提出了对科学工作者的要求。身为专家的政府管理人员,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和科技工作者深入交谈,也体现了当年政府官员的风貌。

早在 1953 年初,朱梅就曾致函人民日报,呼吁重视我国自己的啤酒酒花培植和生产,并向中央轻工业部、农业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视推荐 1951 年由陕西留坝县居民反映的野生酒花,认为稍加培植、改良即可使用。这项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到 1959 年,我国建成了几十个酒花生产基地,并且有出口。改革开放之后,朱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屡有关于酒业发展的提案。1980 年他希望北京市重视发展啤酒产业,呼吁尽早争取外商的帮助,将啤酒产量扩大到 10 万吨,满足市场需要;1985 年,视力已经非常微弱的朱梅又提出两份扩建啤酒厂的建议。他建议扩建武汉东西湖啤酒厂、北京啤酒厂以及顺义啤酒厂,同时为北京兴建年产十万吨啤酒厂的计划延迟提出积极的资金运作方案。在会下,他还曾帮助成都市筹建中的啤酒厂解决人员培训问题。

朱梅晚年,虽然双目失明,但始终关注酒业的发展动态。在夫人章彬英和孩子们的精心照料下,他依旧对我国酿酒产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1988 年 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朱梅联合几位著名酿酒专家的意见“该是调整白酒政策的时候了”。他们指出当时我国酿酒产业发展中应该控制采取有力措施抑制白酒生产,还严厉抨击了酒类评比泛滥的不良风气。20 年后的今天,我国酒类发展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 1989 年后,国家也不再组织酒类的评比活动。这是国家有关政策调整的结果,说明朱梅等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粮食安全考虑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朱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酿酒专家,他是我国第一代掌握西方先进酿造技术在本土酿制出葡萄酒、啤酒、白兰地等洋酒的大师级人物。他数十年在国家管理酒业的领导机关参与技术策划、指导和监督工作,为我国的酒业,特别是源自西方的酒类生产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朱梅曾编著过多种有关酒类酿造的著作。1954 年编著的《葡萄酒》(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发行)、1955 年编著的《白酒酿造》(轻工业出版社)1957 年的《配制酒制造》(食品工业出版社),以及 1959 年与齐志道合编的《啤酒酿造》(轻工业出版社)等,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发行量,是各地大小酒厂常见的技术资料。而与李文庵、郭其昌合编的《葡萄酒工艺学》(轻工业出版社)当年更在有关行业和学校中畅销、1965 年和 1983 年先后发行两版。1949 年朱梅曾在《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上发表过关于我国啤酒历史的短文,是媒体所见的最早文章。他晚年不断发表有过我国酒业的历史掌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作为诞生在 20 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朱梅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希望为祖国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大学中所受的专业训练是艺术和文学,曾经希望通过新闻事业,用笔杆子唤起民众,试图办报而终于失败。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前往法国时,也许是几年文字工作的经历使他转而接受了实业救国的奋斗目标,于是在欧洲开始从头学起,克服语言障碍、经济穷困等种种困难,刻苦专攻酿造,学习洋酒酿造。而他能在学成回国后有用武之地,不能不提到当年由中国银行烟台支行经理出任张裕公司总经理的徐望之。爱国的银行家徐望之对当年张裕公司技术大权一直由外国人执掌颇为不满,希望培养自己的专家。在发现朱梅之后,他给予朱梅有力的支持,资助他在欧洲进行长期的专业考察,回国后即委以重任,甚至把自己的汽车让给在啤酒厂和张裕公司两边奔波的朱梅乘用,这种知遇之恩令朱梅十分感动。新中国成立后,朱梅的专业优势得到了相当的发挥,成就了他有价值的人生。

朱梅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从不计较待遇,在我国酒界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1991 年 7 月 4 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朱梅逝世消息时,对他的盖棺论定是“朱梅同志是我国采用国际现代化酿酒技术的第一代专家。他从事酿酒事业半个多世纪,在开创新中国的酿酒工业和进行酿酒工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青宁生 供稿)